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段从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段从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博雅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0953-0

Ⅰ.①文… Ⅱ.①段… Ⅲ.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
Ⅳ.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4646 号

书　　名:“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
著作责任者:段从学　著
责 任 编 辑:艾　英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0953-0/I·249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75 印张　316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序 …… 温儒敏　1

导　论 …… 1
第一章　“文协”的历史特征 …… 26
第二章　“文协”的建立 …… 39
第三章　“文协”历届常务理事考论 …… 63
第四章　老舍在“文协”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 …… 84
第五章　“有关”与“无关”之外 …… 97
第六章　通俗文艺运动与“民族形式”之争 …… 121
第七章　战地文艺的拓展与推进 …… 155
第八章　“抗战文艺”的历史呈现 …… 172
第九章　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发端及其演化 …… 197
第十章　新文学传统秩序与文艺方向 …… 219

附　录　“文协”的分会 …… 252
参考文献 …… 302
后　记 …… 309

序

温儒敏

“文协”是抗战时期最主要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曾经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团结全国大多数作家，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凡是写现代中国文学史，总会论及“文协”。但迄今学界对于“文协”的研究还比较零散肤浅，基本的史料工作也还没有很好地开展。段从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这部论著，是学界首次对此课题进行的专门研究，具有开拓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该书前半部分梳理“文协”的来龙去脉，考辨基本史实，后半部分论析“文协”组织和参与的重大文艺运动，探讨“文协”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影响。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对“文协”的研究较为薄弱，关于“文协”的基本史实大多出自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错乱较多，所以段从学决定以考辨和澄清史实作为研究起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探讨“文协”对抗战文艺发展的具体影响和历史作用。该书这两部分内容的逻辑关系是很清晰得当的，考辨史实是前提和基础，而分析历史作用则是前者得以成为“历史事实”的阐释学视域。

值得赞赏的首先是史实的清理辨析工作。作者用了二三年时间，从各地罗致了大量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某些过来人的回忆录在内的各种史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辨和清理，纠正了以往学界对于“文协”的不少史实误传，在此基础上，对“文协”的建立、变迁过程及其历史面貌第一次作了较为清晰的勾勒。举例来说，关于“文协”成立的时间，以及“文协”是否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成立，各种回忆录记载不一，有的则是以讹传讹，连一些最权威的文学史（包括我们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都有某些讹误。段从学订正了以往的各种误传，把“文协”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是一大贡

献。可以预料，今后研究“文协”和抗战文艺，都不能绕开这部扎实的论作。

该书另一个贡献，则是在梳理“文协”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文协”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全国文艺作家认同和支持的原因，探讨了“文协”的“文化形象”形成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大都把“文协”当做行政权力机构，段从学的研究引入作家认同的要素，拓展了“文协”存在的历史空间，也提供了研究文学社团和文学组织的新思路。

该书以史料见长，处理史实也显示出较开阔的理论眼光，以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贯彻全文，多有学术创获。如关于批判“与抗战无关论”，文学史叙写历来都是一边倒批评梁实秋，认为是梁氏的错误引起这场批判风潮。段从学从史实出发，重新分析了“与抗战无关论”之争的起因和论争双方的分歧之根源，指出了这场论争的实质不在于梁实秋的错误，而在于“文协”同人试图通过集体批判梁实秋的方式，确立自身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这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公案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的阐释。另外，如对“文协”在抗战时期文学运动中发挥的实际作用的历史描述、对老舍在“文协”中的核心领导地位的考察，以及探讨“寿郭”等活动对于打造新文学传统的作用，等等，都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性的观点。文章围绕“文协”的变迁历史探讨了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文化权力的角逐，从中突显现代文学在1940年代的社会历史境遇，加深了对于这一阶段文学特质的理解。这本书也有些不足，主要是对《抗战文艺》以及当时在“文协”支持下产生的作品评论不足。

记得两年前，参加过一次关于现代文学史料的研讨会，那次会议段从学也在。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谈到史料与研究的关系问题，不妨回忆抄录以下，作为对段从学这部著作的一种体认吧：

> 通常说，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还要补充：史料工作不是研究的附庸，史料的发掘、收集、考证、整理本身，就是学问。史料工作不是拾遗补缺的简单劳动，它有自身的规范、方法与价值，在学术研究的格局中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需要有严格的学术训练与知识积累、周密的思维与扎实的作风，这项工作难度不小，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事实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与古代的朴学以至乾嘉学派有血肉联系，包括目录、版本、训诂，以及校注、辑

佚、考证，等等，传统学术中自成一格的治学理路、方法，对现代史料研究都有直接的影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同时又吸收了一些现代的新进的思想方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以多年来有人在呼吁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应当成为一门专门之学，有他的道理，起码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与尊重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地位，它与阐发性理论性研究是完全可以平起平坐的。

现在学风的浮躁，当然跟整个大气候有关，但也有它自身的渊源。现代文学学科初建之时，就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对史料工作是不重视的。当时历史学界有所谓“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前者强调论从史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论点必须建立在材料之上；而“史论派”则强调理论的引导领先，先有所谓正确的结论，然后找些材料去支持说明。1950 年代，“史料派”基本上失去立足之地。文学史研究出现“以论带史”的风气，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得到时代普遍接受的思想简化，自然跟当时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价值专断有关。1980 年代，学科复苏，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重视史料、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段。

很遗憾，好景不长，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那种“以论带史”的风气如今又有回潮。只不过这个“论”不再是当年那种政治理论，而是其他宏大叙事理论罢了。现在学术生态不大正常，许多学者都很无奈，陷入了所谓“项目化生存”的境地，做学问不是那么纯粹，而是太过受功利的驱使，这种新的“以论带史”的方法因为比较好操作，好“出活”，所以更有市场。那些简单摹仿套用外来理论、以某些汉学理路作为本土学术标准的所谓“仿汉学”的风气，其实也是新的“以论带史”。学术研究当然可以有不同理路，偏重理论也未尝不可，但基本规则与标准还是要有的，那就是实事求是。现代文学研究属于文学的研究，但又带有“史”的特点。这是不能忘记或偏至的。

现代文学每年出版很多专著，实在看不过来。那种“穿鞋戴帽”、以某种后设的理论框架去装一些作品或事例的，或者概念满天飞、花半天功夫无非证说了一点“常识”的，几乎都成为“主流”。我不太欣赏这些华丽而空泛的论作，宁可看点事实考辨之类。现在的文风真的让人有

些腻味了。

这时候来读段从学这本扎实、厚重的论著，不禁又想起两年前那次会上说过的这些话。

2012 年 5 月 20 日于济南

导　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明确而自觉地以领导和组织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为目标的一个全国性文学组织。仅在总会登记的会员,就将近四百人。其人员组成的复杂性和包容性,超越了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文艺团体,初步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作家组织,为后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形式基础。

由于全国文艺作家积极而广泛的认同,和国民政府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文协”组织和参与的不少文艺活动因此而往往演变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潮流,具有了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性质,对抗战时期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后方文坛上的不少重要事件与活动,也只有从“文协”的组织动员这个角度,才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阐释。

本书拟从“文协”旨在领导和组织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这一根本特征入手,以“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变化为结构线索,通过深入清理和考辨有关史实的方式,在全面勾勒“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的基础上,以“文协”组织和参与的重要文艺活动为中心,在这些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来考察“文协”对抗战时期新文学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并从“文协”的组织动员的角度,对抗战时期文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提出新的阐释。

按理,“文协”的活动与“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具体活动的文学组织,会对文学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之所以把“文协”的活动和“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两个研究内容,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协”的基本史实和历史特征了解不多,而且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和偏见。因此,只有以梳理“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直接切入“文协”的历史活动,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来把握“文协”对抗战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就是说,在选择研

究目标时，本书的重心是“文协”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在确定具体研究内容时，却又不得不顾及目前的研究现状，把梳理“文协”自身历史形态的发展变化当做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换言之，本书在“‘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这个题目下，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其一，梳理“文协”自身历史形态的发展变化；其二，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中来把握“文协”对抗战时期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前者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而后者则是最终的目标和归宿。没有对“文协”自身基本史实的清理和辨析，“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反过来，没有把握“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关系这一最终目标作为后设眼光，“文协”自身的历史形态同样也难以确定。归根结底，任何一种所谓的“历史事实自身”，都只能在特定的后设叙事视域中呈现出来，而不可能是自我显现的结果。

一

文学史著述是研究水平和现状的缩影。“文协”研究尚待深入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几种重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文协”的概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史实缺陷。我们不妨以两个具体的细节为例，来透视几种重要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描述“文协”基本情形时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细节，是关于“文协”成立时间的叙述。1943 年 3 月，“文协”成立五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一文中，描述“文协”成立的历史情形说：

> 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注意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

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①]

郭沫若既是历史当事人，文章又专门为“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而作，加之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声望，这篇文章一直颇受现代文学史家重视。王瑶和唐弢，都直接参照了上面的这段文字。

但实际上，这段文字既不够准确，又有明显错误。以不够准确之处而论，首先，“文协”的全称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而非“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次，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教育家、宗教家等等均参加了“文协”的说法，也与实情不符。“文协”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写作者的团体”，向来不接纳“对文艺仅有爱好的热情，并不主张把自己的精力寄托在文艺部门努力工作的会员”。[②] 曾有个别分会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或不了解“文协”章程而吸收了非文艺工作者，总会指示的处理措施是：“会务必须由本会会员指导，其未取得会员资格的宜赶快填其入会证交付审查。至于所容纳的非文艺工作者，不妨暂在会中工作，一俟艺术界各部门的协会成立，即可转入”[③]，毫无通融余地。

如果说这些细节上的不甚准确之处还无关宏旨的话，郭氏接下来称戏剧界和电影界全国性组织是继“文协”之后成立的，就属于明显的错误。事实是：“文协”成立于 1938 年 3 月 27 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于 1937 年 12 月 31 日[④]，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于 1938 年 1 月 29 日[⑤]。其中，剧协的成立不仅比“文协”要早，而且对“文协”的成立产生了直接影响：正是因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实现了戏剧界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剧协的发起人阳翰笙才产生了“更进一步的去谋求我们整个文

---

①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1943 年 3 月 27 日《新华日报》第 3 版。

② 组织部：《组织概况（文协成立三周年时）》，《抗战文艺》第 7 卷第 2/3 期合刊（1941 年 3 月 20 日）。又，抗战时期出版条件艰难，各刊物大量出版合刊以维持正常出版周期。为方便计，本书特别用“X/X”标示，如“2/3”，即表示该册刊物为 2、3 两期合刊。

③ 老舍：《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抗战文艺》第 4 卷第 2 期（1939 年 4 月 25 日）。

④ 参见《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纪念特刊》（1937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日报》第 4 版）和《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昨举行成立大会》（1938 年 1 月 1 日《武汉日报》第 3 版）。

⑤ 参见《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成立纪念特刊》，1938 年 1 月 29 日《武汉日报》第 4 版。

化界的统一与团结”的想法[①],在剧协成立大会上与王平陵一起提出了组织“文协”的设想。“假如没有剧协的成立,文协的组织至少会推迟或者是另外一个样子”[②],而不是“文协”的成立推动了戏剧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文艺组织的建立。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不仅沿袭了郭沫若的错误,而且点明了郭沫若隐含着的意思,称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受到了“文协”成立的影响。[③] 俗称“唐弢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注意到了戏剧界抗敌协会先于“文协”成立的事实,总体叙述却仍然沿袭了郭沫若的错误:“‘文协’之后,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抗敌协会也先后成立。”[④]

另一个细节,是蓝海(田仲济)对“文协”的叙述。

抗战胜利不久,蓝海就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其中这样描述“文协”:

> 在组织方面,文协分会已成立的这时有:成都、香港、昆明、曲江、桂林、贵阳、延安、晋东南等地。广州、长沙、延安、香港、上海等处并有文艺通讯员的组织。
>
> 最早从事这种组织的是广州文协分会,在他还成为广东文学会时便有这种活动了;不几天内就有了三四百个通讯员,他们分布在广东各县,以及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其中有青年学生,有低级公务员,有店员学徒,也有产业工人。长沙的组织比广州略后些,以后和广州同样,都停顿了。继续活动较久的有延安,上海和香港。北方的荒僻地带竟有文艺通讯员五六百人,在那里他们称为“文艺小组”,这类小组普遍地分布在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部队里边。上海有三百来人,香港则比较少些。在五战区襄樊一带,也有文艺站的组织,不过好像没能怎

① 阳翰笙:《我的祝辞》,1938年1月1日《武汉日报》第4版。

② 文雨(文天行):《试述“文协”的成立》,《抗战文艺研究》1982年第4期。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王瑶文集》第4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8页。

④ 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页。

样普遍。[①]

细读上下文，蓝海这里要谈论的，其实是“文协”分会的组织和全国各地的文艺通讯员运动两个并列现象。两者虽有部分重合的相关之处，但并非同一回事。否则，证之以“文协”史实，关于文艺通讯员运动的文字，几乎全得改写。尽管如此，蓝海把先于“文协”成立，而且自己独立开展活动的广东文学会当做“文协”广州分会来看待，仍不符合历史事实。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文学史部分，系李欧梵执笔。其中不仅延续了蓝海的错漏，把先于“文协”成立的广东文学会错误地当做“文协”的分会，进而把广东文学会组织的文学通讯员运动当做“文协”发起的活动，以至于得出了“文协”的通讯员遍及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各地，“甚至在中国北方农村，会员的人数估计也达五六百人”这样的结论。此外，李欧梵还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混淆成了“文协”的工作，说“协会还组织了最初的五个宣传队（每队有十六名队员）和十个演剧队（每队三十人）”[②]。这，就更离谱了。

有意思的是，李欧梵参照蓝海，蓝海在修订《中国抗战文艺史》的时候，却又反过来参考“唐弢本”。

关于“文协”成立的历史背景，初版本《中国抗战文艺史》是这样描述的：

> 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相继沦陷，政治中心移到了武汉，从这些以及各地来的作家都集中到了那里，一致地感到过去的散漫，缺乏组织，减轻了工作的力量。在共同的要求下，一个空前的文艺界的组织在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二十七日于汉口成立了，这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③]

修订本中，蓝海除了根据阳翰笙的回忆，增加了阳氏受周恩来委托发起“文协”的说法之外，又根据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周恩来领导武汉地区的抗战文艺运动当做了“文协”成立的基本背景。

---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上海：现代出版社，1947年，第51页。

② 李欧梵：《走上革命之路》，《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03页。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上海：现代出版社，1947年，第41页。

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虽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极力避免“以论代史”，但该书在论述“文协”成立的历史背景，断言包括“文协”在内的国统区文艺组织均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时，却明显未能避开“以论代史”的陷阱：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来到武汉。他十分关心抗日文艺运动的发展，亲自领导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运动。他通过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以及亲身参加和组织各种抗日的文艺活动，与文艺界保持广泛的联系，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教育与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拿起笔来投入战斗；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把聚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除了一部分输送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绝大部分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都被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文艺大军。

根据这个宏观政治背景，该书进一步推出了“文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论：“党通过‘文协’中的党员与进步作家，有力地领导与推动了抗日文艺活动。”[①]事实上，当时中共的首席代表是王明，而不是周恩来；断言周氏“亲自领导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国统区文艺运动”，也值得进一步推敲。据此推定“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显然“论”大于“史”。

蓝海在修订《中国抗战文艺史》时，直接挪用“唐弢本”的有关文字来描述“文协”成立的历史背景：

> 一九三七年底，周恩来同志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的身分来到武汉，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并十分关心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他通过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以及亲自参加各种抗日文艺活动，与文艺界进

① 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5页。

> 步作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动员文艺工作者拿起笔来投入战斗。经过他的精心策划，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把聚集在武汉的大批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的文艺队伍。

断言“文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同样来自于“唐弢本”：

> 周恩来同志通过“文协”中的党员和进步作家有力地领导了文艺运动，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①

抛开“唐弢本”的问题不论。李欧梵沿袭蓝海，而蓝海又反过来沿袭唐弢，唐弢和王瑶等人沿袭郭沫若的现象，本身就足以说明：研究者尚未真正深入“文协”自身的历史现场，主要是依靠二手资料来支撑有关“文协”的历史叙述。

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述中，这种情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比如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称“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先后一共出版了 71 期②，但实际出版期数是 74 期，其中第 10 卷第 4、5 两期合刊编好后未能印出，另有“武汉特刊”4 期，以及《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和《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两期特刊。孔罗荪的回忆③、唐沅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均有详细辨析。

上面提到的几种文学史，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严谨而认真的著述，足以代表现代文学史编纂的基本水准。正因为如此，其中关于“文协”的史实缺陷反过来说明：我们对“文协”的研究和了解，相当薄弱。

二

迄今为止，关于“文协”的文学史知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文字。这些回忆，对“文协”的基本情况和相关的历史背景

---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修订本），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年，第 31—34 页。

②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46 页。

③ 孔罗荪：《〈抗战文艺〉回忆片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 1 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年，第 205 页。

作了初步的叙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文协”提供了史料线索和范围。第二，是关于老舍与“文协”的回忆和初步研究。这些文章，重点围绕老舍出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展开，主旨不在提供历史材料，而在为“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作辩护，肯定“文协”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第三，是以西南地区的文史工作者为主的专业研究人员对“文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初步的研究。

孔罗荪的《〈抗战文艺〉回忆片断》是最早的一篇回忆[①]。文章除介绍《抗战文艺》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情形之外，还有两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是对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茅盾五十岁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三个特辑作了重点介绍。二是较为具体而翔实地叙述了“文协”发动全国作家声讨周作人北平附逆、批判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等几次文艺思想方面的论争的情况，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历史资料。老舍代表“文协”起草的致《中央日报》负责人的公开信，就是孔罗荪首次披露出来的。历史上，不少“文协”参与或者与“文协”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往往没有直接的外在联系。孔罗荪的回忆，确认了不少“文协”参与或与“文协”相关的活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孔罗荪这篇回忆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962年，距离历史事实发生的时间相对较近；写作中，曾查阅过全套《抗战文艺》等历史文献。因此虽有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辨析，但总的说来史料的准确性和可信度都比较高。1980年，孔罗荪对这篇文章作了修订和补充，改题为《关于〈抗战文艺〉》[②]，重新撰写了文章的引言，增加了介绍《抗战文艺》终刊号的文字。遗憾的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孔罗荪对某些具体内容的删改，反而损害了当初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比如最早谈及《抗战文艺》编辑人员时，孔罗荪承认自己只是参加一部分编辑工作，“参加编辑工作最长的是姚蓬子，特别是从第六卷

① 孔罗荪：《〈抗战文艺〉回忆片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03—212页。

② 孔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以后，主要是由他负责编辑的”[①]，但《关于〈抗战文艺〉》却删除了这句话，抹去了姚蓬子的历史贡献。

胡绍轩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是第一篇，也是迄今唯一以亲历者身份，全面叙述“文协”基本情况的重要文章。[②] 该文按照诞生之前、筹备经过、大会盛况、组织发展、工作概要和胜利结束的时间顺序，全面叙述“文协”成立之前各地文人云集武汉的时代背景、“文协”的筹备经过、“文协”成立大会的基本情况、各地“文协”分会的简要情形、“文协”开展和组织的主要工作及其最后结束等基本历史情况。首先，文章对“文协”成立的时代背景、成立经过等情形的叙述，翔实具体，史料价值较高。其次，文章还简要介绍了“文协”十三个分会或者类似组织的情况，补充了同类文章的缺失，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实和线索。此外，胡绍轩注意到了“文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把“文协”的活动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重点介绍了抗战初期的通俗文艺运动、中期的对外宣传与提高抗战文艺质量的努力、后期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等几项重点工作。这就比较清晰地凸现了“文协”在历史情境中的变化发展线索，突破了一般回忆和研究文章仅仅根据“文协”成立之初的情况来为“文协”的意识形态性质辩护，无视其内在历史变化的僵化模式。

胡绍轩在撰写时，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并参考了他人的回忆和研究。这篇文章因此一方面具有史实丰富全面的优点，另一方面也沿袭了他人回忆中的错漏。

除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之外，胡绍轩还撰写了《一张照片的回忆》、《应该肯定老舍对“文协”的领导作用》、《阳翰笙第一个发起筹组“文协”》等回忆文章[③]，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

① 孔罗荪：《〈抗战文艺〉回忆片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第212页。

② 胡绍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12—33页。该文亦曾收入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一书。

③ 以上文章，均收入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一书。